

秘密使命

(美)埃·马·扎卡里亚斯 著

何 新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秘 密 使 命

〔美〕埃利斯·馬·札卡里亚斯著

何 新 譯

(內 部 发 行)

群 众 出 版 社

1979年·北京

秘 密 使 命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84千字

1964年 6 月第 1 版 1979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内 部 发 行

定价：0.34元

出版說明

本书作者札卡里亚斯是退休的美国海軍少将。他在美国海軍服役三十八年，曾任海軍战艦舰长、海軍情报局副局长和代理局长等职。作者从事情报工作达二十五年之久，“秘密使命”一书是他从事情报活动的回忆录。

原书分为三部分，本书只选譯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一些章节。这里作者談到了太平洋战争前和战争期間，美国情报机关同日本、德国間諜机关所进行的斗争，并且列举了不少事例說明美国情报机关如何向日本武官套取情报，如何向德国海軍进行心理战，等等。本书虽作了删节，但由于作者的立場很反动，书中仍有很多粉飾美国情报活动和自我吹嘘的地方，需要讀者在閱讀时加以注意。

目 录

第一章	鳩津大佐露了馬脚.....	1
第二章	在間諜的夹击中.....	10
第三章	間諜战开始了.....	19
第四章	医生办案.....	26
第五章	双重間諜和外交官.....	33
第六章	人种学者成了战略家.....	44
第七章	日本在西海岸的間諜网.....	49
第八章	珍珠港事件的教訓.....	62
第九章	战时的华盛顿.....	81
第十章	海軍情报局.....	86
第十一章	OP—16—W	94

第一章

鳩津大佐露了馬脚

我的新任命补偿了我东京之行的失望，我奉命领导海軍情报局远东处。

海軍情报局的組織和設置是为了使它能够执行双重职能：情报工作和反間諜工作。第一項工作交給某些地区研究部門，它們搜集有关外国舰队和外国海軍政策的情报。另一項工作被交給了反間諜工作处，它的責任是不让外国間諜分子和破坏分子了解到對我們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的活动，保障我們自己海軍的安全。

和平时期在我們的情报中約有 95% 得自公开来源，如国外出版的书籍，旅行家的观察报告，报纸上的文章或者专业杂志上的研究論文以及外国无线电台的广播和类似的其他方面。此外，有 4% 得自半公开的来源，比如海軍武官的报告或者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日常业务时，消息灵通人士所搜集的資料。只有 1%，甚至往往比这个比例更少，是得自真正的秘密来源，比如情报人員的报告和从某些心腹朋友和認識的人那里得到的情报。这些秘密情报人員所能提供的情报，很少是一个警惕的分析家所不能得到的。这种分析家知道他要找的是什么，也知道如何从公开来源找到这种情报。

由于外国时常建立障碍，因此情报机构就不得不把精力浪费到实际上不需要进行秘密工作的地方去进行情报工作。比較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和日本海軍的情况就能說明这个問題。在和平时期，我們海軍的大部分資料都是日本观察家很容易得到的，只有某些軍舰构造上的秘密除外——然而其中大部分也是

一个訓練有素的情报人員能够看得出来的。国会的辯論、拨款法案的討論、技术杂志上的文章以及类似的公开情报来源提供了所需要的大部分資料。我們的海軍基地和其他海岸設備是随便外人参观的。我們的战斗舰在非工作時間也很容易上去，在舰队檢閱期間，它們也欢迎客人到軍舰上去。它們从来不查問客人的身分。我們所截获的情报人員的报告有时候說明，他們曾經坐了軍舰进入禁区。在《璦恩軍舰年鉴》和其他年鉴上透露了关于我們海軍的規模、軍舰的力量和装备，以及它們的行动、演习和其他細節的一切材料。✱✱

日本海軍是多么不同啊！什么也不让外人看見，他們的軍舰通常总是放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海軍基地被宣布为不得擅自进入的地区或者是禁区；如果說帝国国会竟然討論撥款的話也討論得很少，整个机构都籠罩在秘密气氛里，他們甚至发出騙人的資料来混淆視听。这时候，我們海軍情报机构面临的任务是透过这种叫人摸不着头脑的帘幕去查看后台的准备情况。这种工作遇到的困难往往比較小，因为它只是根据一般的标准进行比較、分析。有时候某些問題必須得到答复。比如，日本人真的在建造裝有十八吋口徑大炮的四万五千吨的主力舰嗎？某些海軍基地真有新的海岸工事嗎？日本海軍或者他們的海軍造船厂的实际人力情况如何？对这些問題，即使不雇佣秘密情报人員，也常常能够通过研究和調查得到回答。但是要解决的主要問題は舰队的意图，以及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如何利用軍舰和基地。这些問題却需要进行真正的情报工作。但是，即使在这一方面，普通常識加上思考能力所发现的綫索也比秘密情报工作多。

在这个复杂問題中，應該強調指出的另一方面是，在和平时期我們的情报活动毫无生气，到战争爆发以后，才去加强它。这种根本錯誤的态度势必使得我們整个国家安全机构发生严重的缺陷。必須認識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情报在和平时期象战争时

期一样重要。一个国家越能使它的情报机构对于和平时期的任何不測事件有充足的准备，那么它就越有希望維持和平或者縮短战争。和平时期的情报工作方法在战争时期还要更大規模地繼續使用。因此，对外国的广播不是偶而收听一下，而是要經常注意敌人的一切无綫电广播途徑；訓練有素的情报人員要遍布各地，繳获敌人的文件；情报軍官的办公桌上应經常堆滿資料。在战争时期成包成捆地送到这些办公桌上的資料，必須在和平时期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

但是，什么是和平呢？从情报軍官的观点来看，“和平”是一个騙人的名詞，是渴望永久的平靜的人为了欺騙自己想出来的。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深深地認識到，象绝对和平这样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当所謂热战过去以后，战争在騙人的表面和平下繼續进行。战胜者和战敗者用外交、經濟和心理手段繼續进行战争，这种战争的緊張和卑鄙的程度常常是热战很难达到的。甚至热战在公开的敌对行动結束以后，仍然以其他手段繼續进行着。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剛一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远远沒有开始以前，就在进行战争。現代生活的整体性以及現代社会的复杂性注定我們要进行永久性的战争，即使我們在这个时候带着懊悔的心情談到永久的和平，好象这是眼看就能得到的万灵药，用这种方法来平靜我們不安的良心。

正是在这种名义上的和平气氛中，我担任着海軍情报局远东处处长的职务。在那些年代，我們的工作所受到的限制對我們有极大影响，我們要想打破受限制的狹隘的工作範圍是无能为力的。于是我們就在小心保存的档案中搜集例行的資料。担任这项工作的人員数量非常不足，以致毫无希望进行雄心勃勃的工作。事实上，我是远东处全部工作人員的一半。其他一半是我的秘书薩布勒特小姐。与此同时我們的潜在敌人日本，在他們的过分龐大的北美部門却有好几十个人。后来又派了一个軍官到我們的部

門來，他懂中文，專門處理有關中國的問题。

正当我們同錯誤的節省和眼光短淺的限制進行斗争的時候，事態迅速地向着1931年開始的風雲變幻的局面發展。在年初的時候人們已經感到不安。有某種明確的跡象說明，日本人準備把它的田中奏折變成行動，越過大海進入它的滿洲“生存空間”。到1931年3月的时候，局勢已經非常嚴重，這說明我應該同兩個對於遠東問題都極感興趣的朋友進行談話。其中一個是美國陸軍（情報局）的悉尼·F·馬希比爾中校（預備役），他象我一樣是一個懂日文的軍官。另外一個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詹姆斯·F·摩萊爾蒂少校，他是一個出色的軍人（飛行員），是一個能說流利俄語的語言學家。我們決定盡一切努力查明真象，我們開始在腦筋里設想日本人的可能作法。我們還覺得我們應該盡量直接從馬的嘴里套出情報來，看看我們的忧虑是否有道理。這匹馬就是日本駐華盛頓陸軍武官，帝國陸軍大佐鳩津正平。我們時常同他打高爾夫球，關係非常友好；還常常打完高爾夫球以後到他的公寓去喝酒，這在禁酒時代是特別受歡迎的。我奉命首先採取步驟把我們的高爾夫球變成真正的工作。我打電話給他說：“下午好，陸軍大佐，這些日子高爾夫球打得怎麼樣？”

“嗨，不怎麼樣，不太好，”鳩津哼哼道。

“最近找個時間我們打一次怎麼樣？”

“那太好了。你能不能在今天下午到我這裡來喝酒？”

這簡直太好了。矮小的大佐上圈套了。

“我很高興。不過我要先會見馬希比爾和摩萊爾蒂，我已經答應他們了，然後再安排這件事。”

“你為什麼不把他們也帶來呢？”陸軍大佐問。

“我確信他們一定也會很高興到你那裡去。你知道這是禁酒時代。什麼時候呢？”我問道。

鳩津說，“隨便什麼時候，五點怎麼樣？”

“行，五点钟我們准到。”我回答說。在我挂上电话耳机的时候几乎忍不住笑了起来。

按照日本习惯，我們在五點整按了波特兰公寓三層樓鳩津住宅的門鈴，这是第十四号街和托馬斯广场拐角处的比較古老的建筑之一。这是一个單調的、設備簡陋的公寓，但它是鳩津的办公室兼住宅——日本的陆海軍武官通常总是住在他們工作的地方。

鳩津陆军大佐已經召来了他的两个助手——寺本空军中佐（空军武官）和广田裕少佐。寒暄以后，我們很快地就喝起了苏格兰威士忌酒和汽水。酒很普通，酒性并不太烈，这說明鳩津并不打算向我們提出任何重要的問題。他是作为临时的社交性晚会来安排这次聚会的。在1931年的时候，能够一般地談論的問題很多。我們并不急于要立刻执行我們的使命。尽管这样，气氛仍显得有些緊張。

因为就在这一年內潮流改变了，事态的发展和世界局势的恶化使人明显地看到，战争很快就要爆发。日本显露的一切迹象表明，它已决定在某个方向进行一次軍事冒險。我們首先考慮的問題是：第一，他們将向哪个方向进攻？第二，这将是一次陆军行动，还是一次海軍行动，或者是一种陆海軍合作的联合行动？我們希望利用鳩津和他的几个助手作为試驗品来得到有关这些問題的回答。但是，我們并未急于求成，而是在这傍晚酒会的愉快气氛中，慢慢地等待着。

鳩津建議从楼下的飯館叫菜上来，留我們在他那里吃晚飯。我們感謝他的盛意，接受了邀請。

我們閑談着。我們談到了鳩津的官运，因为他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打破了一百。当寺本中佐回到房間来繼續喝酒的时候，我們問起他时常到紐約去看的滑稽表演。我們向广田裕少佐問起了華盛頓流傳的有关他的風流韵事。尽管大家互相揶揄和进行輕松的談話，但是自始至終都保持着尊嚴。鳩津大佐是他那一級的日

本軍官中的典型，他的个子不高不矮，一副小臉，臉盤清秀端莊。他帶着眼鏡，總的外表非常象海因里希·希姆萊。他不大喜歡說話，但是他說話总是很精確。

寺本中佐就是一個比較不同的類型。他有一副普通日本人的圓臉，他的短短的頭髮使他显得很突出。就一個飛行員說來他是相當沉靜的，他的確有一個優秀飛行員常常具有的特別寬的下顎。

助理陸軍武官廣田裕少佐具有陸軍那種典型的粗獷的自信和單純。他在美國已經呆了幾乎四年了，他是陸軍武官處里的永久組成部分和動力。他的肌肉很結實，他的不相稱的體形使他幾乎成了漫畫中的那種奇形怪狀的日本人。但他的眼睛有一種光彩顯出了他的開朗的性格，這就緩和了人們的印象。喝了几杯酒以後，他的開朗性格表現了出來，顯得特別愛講話，而且時常大笑，他覺得這是“典型的美國派頭”。

顯然，我們所面臨的三個日本人屬於三種截然不同的類型。因此，我們預料當我們在这次“制造出來的”集會上談出使他們惊奇的事情的時候，他們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反應。我們把觀察工作做了分工。我們約定在我向他們提出問題的時候，由我來觀察鳩津，馬希比爾觀察寺本，摩萊爾蒂觀察廣田裕。他們對問題的反應——而不是他們的回答——才是綫索。

在晚餐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們的談話好象不知不覺地轉到了中國的局勢和中國人的態度。在軍閥張作霖的統治下，華北和滿洲的局勢的確很混亂。我表示同情日本，並且表示充分理解他們在滿洲的局勢面前所遭遇的困難。這時，在我們的三個敵手的臉上顯出了一種愉快的微笑，這使我相信我的誘餌是很有吸引力的。最後，在我們認為是一個絕妙的時機，我轉向鳩津陸軍大佐，用一種最嚴肅的語氣問：

“陸軍大佐，如果當你們侵入滿洲的時候，中國的其他地區

都进行抵制的话，你认为日本能够坚持下去吗？”虽然我的话装得像是随便问的，并没有在某些字上加重语气，但这个问题是预先准备好的，在我们到鳩津的住宅去以前就经过排演的。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是我们为了得到所需要的线索而提出的挑衅性问题。我们没有失望，因为他们的反应是十分说明问题的。陆军大佐脸上泛出了深红色，把手蒙在嘴上清了清嗓子，显然很难说出话来；寺本中佐当时正在呷着酒，一听我的话噎住了，显得很惊慌，不得不走出房间去；广田裕少佐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而且控制不住自己，和椅子一起倒在地上了。这时，馬希比尔、摩萊尔蒂和我彼此看看，眨眨眼睛。虽然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复，但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线索。

当房间内恢复平静，寺本又回到房里来时，我们就接着提出了我们原决定要提出的其他两个诱导性问题。这次是馬希比尔提出的，他的目标是陆军大佐，但也是针对所有的三个人，所以他在说完话的时候，很快地扫视了一下大家的脸色。

“陆军大佐，你认为一旦日本采取这种行动，国际联盟会怎么样？”

广田裕少佐第一个接过话头。他很快地用一种嘲笑的语气回答说，“嗨，国际联盟算什么。他们不过只能空谈一阵罢了！”

摩萊尔蒂很快就接着提出了他的问题：“陆军大佐，你们会在滿洲扶植溥仪当傀儡，象西伯利亚的麦尔克洛夫将军那样吗？”

回答问题的又是广田裕，这说明他是这几个人里面的主角人物。

“可能是这样，”这时候他用一种非常严肃的语气说。

如果说我们曾经无意中发现了什么的话，那是鳩津陆军大佐通过一种严格的日本礼节，给了我们关于时间的线索：在我们就要起身告辞的时候，谈话转到了摩萊尔蒂在华盛顿的工作期限问题，我们说，预料他将在 11 月离职。当我们走到大门口的时候，

鳩津陸軍大佐（就速度而論，他的準確的日本腦筋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判斷力却不是那麼強）突然說：

“摩萊爾蒂少校，我願意在你離開以前為你舉行一次送別宴會，時間必須在9月里，因為10月我非常忙！”而說話的時候不過是1931年3月。

我們三個人在步行回家的時候，把觀察結果串聯起來，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東西。很显然，日本陸軍已經計劃在最近的將來執行侵入滿洲的計劃。我們已經發現了日本陸軍的一個最大的秘密。

我們在向上司報告結論以前，決定設法尋求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在這個陰謀中是否包括日本海軍。所以我們決定，首先通過打高爾夫球和其他活動認識日本海軍武官和他手下的人員，然後對他們採取完全相同的作法。我們肯定地相信，在安排對海軍武官下村海軍大佐進行這種訪問的時候，我們必須有同樣數目的助手，因為日本人總是認為他們的人數應該同在座的外國人相等，他們認為這點很重要。

在我打電話給下村海軍大佐的時候，他的反應同鳩津完全一樣，同樣的客氣，同樣的邀請。“來喝酒怎麼樣？”我也象上次一樣表示有些遲疑，假裝說已同馬希比爾和摩萊爾蒂另有約會了，於是他也建議把他們一道帶去。一切都按照計劃和程序進行，唯一的區別是海軍武官的住所在另一個地方，也沒有請我們吃晚飯。

他的公寓房間在馬薩諸塞大街和威斯康辛大街拐角的一座時髦的大樓里。這個住宅一直是歷任各海軍武官的住宅和辦公室。在那些日子裡，他們到美國來是不帶家眷的，這主要是因為把她們帶來以後，就會使她們具有一種在國內所不習慣的社會地位。

這次喝的蘇格蘭威士忌酒的牌子已經不同了，但是味道還是同樣的好。我們在談話中天南地北無所不聊。最後我們對日本在中國遇到的困難假惺惺地表示了一點同情以後，就提出了大問題。

我們等待着。我們看不出那怕是絲毫的反应，只听見下村海軍大佐用一种溫和的、慢吞吞的声音說“嗯，我真不知道。”

馬希比尔、摩萊尔蒂和我彼此看了看。我們的眼色里这次有另外一种含义。

这一次當我們走回家的时候，大家沒有什么辯論。但是这次又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陸軍將北进，而他們的海軍却望着南方。我們的思想里已經不再有任何怀疑，两个問題都得到了毫不含糊的回答。在第二天，我拟定了一份报告呈給海軍情报局局长，用一种不可知的結論估計了形势。但是，我在报告中措詞肯定的說，日本陸軍即将进攻滿洲，然而不让日本海軍知道，并且不要海軍的支持。这是1931年3月的事情。在1931年9月18—19日夜間，日本和中国在滿洲发生了“麻煩”。

但是当一個平靜的星期六下午从無線电傳來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已經不在海軍情报局。我在会見鳩津、下村和他們的助手以后不久，在舰上职务和陆上职务的例行对調中，被調到“多西号”驅逐舰担任舰长了。

但当我准备离开华盛顿时，我又受命陪同高松宮亲王（天皇的第二个弟弟）和他的王妃到美国各地参观訪問。这給了我不寻常的机会来經常地而且就近地研究这一行十个日本高級人物，使我后来对日本最高司令部进行心理战的时候，能够得到日本人的难以取得的信任。

第二章

在間諜的夾击中

1931年后，我在海上和海軍軍事學院渡過了將近三年，又回到了華盛頓——我喜歡稱它是我的自然住所——繼續擔任海軍情報局遠東處處長的職務。

我在1931年離職的時候，遠東處仍然人員不足，工作太忙，作為我們防禦體系的一個真正有效的部分，它是遠遠不夠的。但是在1934年的時候，氣氛不同了，第一次令人感到有一種清新的微風吹滿了海軍情報局的船帆。作為海上強國，美國意識到了加強自己艦隊的必要性。海軍部非常了解它作為美國的第一防線的責任。海軍儘管還受到外交方面某些失敗主義的影響以及國會中某些派別的孤立主義冷淡態度的阻礙，但它仍然全速前進，得到了白宮和它的重視海軍的主人的支持。

在海軍部的每一個部門里，都可以明顯看到這種改變，在情報局里這種改變則特別令人滿意。現在領導海軍情報局的是威廉·迪爾沃思·帕爾斯頓海軍上校，他是一個理想的策劃者，他對愚蠢和無所事事始終採取不能容忍的態度，他善於以無比的热情感動他的下屬，以他自己的機智、精力和工作熱情為取得許多重大成就指出道路。我們情報局在他的領導下所取得的進展，甚至在今天還能在情報活動的各个方面看得見。因為他懂得如何把一直陷於停滯的許多工作推動起來。他使我們能夠實現建設性的主張，我們中間的一些人在進行調查工作越出了範圍的時候他願意承擔責任。在那些年代里，海軍情報局在平凡的活動中是很愉快

的，事实上，这大概是我們的情报工作发展順利的年代。

当我重新担任远东处处长的时候，要作的工作很多，而且我手下也有足够的人来完成摆在我們面前的任务。我对于远东处所进行的活动稍微檢查了一下以后确信，在間諜战争中我們是被进攻的一方。在前些年里，我曾把精力集中在情报的搜集方面；但是現在，“敌人”布署了他的特工人員来对付我們，我的助手和我就成了反間諜工作人員了，也就是說，我們主要不是搜集关于“敌人”的情报，而是設法防止他們搜集关于我們的情报。

我到达华盛顿以后不久，有一个提供消息的人送給我們一本日文书，这本书令人信服地证明，美国現在是日本向外擴張的对象。乍一看來，这本书好象十分平常，不过是一本給日本男女小孩看着玩的儿童讀物，就象我們自己的孩子欣賞“奥茲的魔术师”的冒險記一样。但是更仔細地研究了这本儿童讀物以后，我們发现，它不是一般的消遣书。这本书是到那个时候为止我們曾經看到过的最坦率地暴露日本未来計劃的书籍。其中特別有一副粗糙的小插画，暴露了我們对手的野心。插图上画着两个日本小孩站在“帝国新地图”标字上。这两个小孩本身就是杀气騰騰的，一个穿着陆军制服，戴着鋼盔，另一个穿着海軍制服，两手高举着，嘴巴張得大大的，无限热情地高呼万岁。他們脚底下的地图包括整个太平洋，从菲律宾群島到旧金山和馬雷島。小小的日本太阳旗象征着日本进行征服的踏脚石，有一面旗帜插在标明为菲律宾的地方，另一面插在关島，第三面插在夏威夷，第四面插在旧金山。穿陆军制服的小孩站在菲律宾和夏威夷，穿海軍制服的小孩一只脚踏在关島，另一只脚踏在馬雷島，这象征着日本陆海軍所担負的不同任务。

当我研究了这本书并且認識到它的意义以后，我建議把原书連同全部譯文送交白宮。我們这样作了，这一資料立刻引起了罗斯福總統的注意。如果說原来希望日本人仍然遵循和平目的，或

者在这一方面还有任何幻想的话，我觉得这本图画就会使这种希望和幻想烟消云散。总统在看到这本书以后既感到惊奇也感到兴趣；毫无疑问，这对于制订未来的政策是有影响的，这项政策导致他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封锁演说。他在这篇演说中，建议我们孤立侵略者。

对我们海军情报局远东处的人说来，这幅图画是一个总动员的号令。它着重说明了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已面临的严重危险，并且向我们扼要指出了当前的任务。但是，正当我们这样把注意力集中在来自远东的威胁的时候，有一些情况迫使我们注意准备对我们进行夹击的另一面的颠覆力量，即希特勒德国，它已经同日本汇合起来对美国进行秘密战争。

在一本亲笔签名的、送给我的书上，有这样的话：“送给美国海军上校埃利斯·马·札卡里亚斯。如果你喜欢这本书，那就是对我的最高赞扬。”当我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这样一段话：“目前美国政府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里有一个纳粹间谍网。甚至没有任何人怀疑这一点，就连联邦调查局或者是 G—2——美国陆军情报局也没有怀疑到这一点。这种想法好象太荒谬了。纳粹德国为什么要阴谋危害我们国家的防御呢？”

这几句话是联邦调查局——这个出色的调查和执法机构所曾雇佣的一个最出色的人员列昂·G·塔罗写的。可能在 1935 年的时候，当局“甚至没有怀疑到”在美国存在一个纳粹间谍网。如果他的说法是正确的，而且联邦调查局和 G—2 都不知道间谍网的存在的话，那就意味深长地说明了我们在保卫自己和对付这些纳粹情报人员的时候的那种自满。至于我们自己的组织——海军情报局，的确曾怀疑过有纳粹间谍网存在，因为事实上，迫使我们在 1935 年进行最重要工作的是纳粹而不是日本人。

1935 年 9 月 25 日，德国商船“欧罗巴号”即将起程开往不莱梅。它在纽约停靠的时候，码头上老是挤满了乘客、送行的亲戚